

蔡邕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

刘德杰

在东汉后期文坛上，蔡邕是当之无愧的文坛领袖，而且，蔡邕是汉魏文风转变的关键人物。然而，近百年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蔡邕一直被边缘化，研究相当沉寂。直到近三十年，他才逐步迈入学界视野，成为当今研究热点之一。实际上，与蔡邕研究一样，大多数东汉文学家研究在20世纪也遭遇了同样的经历。蔡邕研究正是东汉文学研究的一个缩影。

20世纪初，深入研究蔡邕的首推刘师培。刘氏论文，罕涉道德评价，专从艺术手法与艺术风格入手，做精微细致的剖析。他的《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共分二十一节，除第八节《史汉之句读》外，每一节都把蔡邕文章，特别是他的碑铭文，作为东汉文学的典范，反复论述，极为详赡。他的基本做法是，着眼于整个汉魏六朝的文学流变，而以推衍刘勰《文心雕龙》^①的观点为主。概而言之，主要是以下几方面：(1) 论文学风格。《文心雕龙·才略》说“蔡邕精雅”；刘师培认为蔡邕之文绝无繁冗之累，“精雅”之说“实为定评”，并解析说：“精者，谓其文律纯粹而细致也；雅者，谓其音节调适而和谐也。今观其文，将普通汉碑中过于常用之句，不确切之词，及辞采不称，或音节不谐者，无不刮垢磨光，使之洁净。故虽气味相同，而文律音节有别。”^② (2) 论运笔巧妙。《文心雕龙·诔碑》

说“(蔡邕之文)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刘师培说：“试观蔡邕所作碑铭，序文头绪虽繁，不分段落而事迹自明；铭词通体四言，而不改句法，转折自具。”^③又说：“蔡中郎用笔在轻重之间，故其文浓淡适中。”^④ (3) 论文学地位。《文心雕龙·诔碑》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刘师培说：“至于蔡中郎所为碑铭，序文以气举词，变调多方；铭词气韵光彩，音节和谐；在东汉文人中尤为杰出，固不仅文字渊懿，融铸经诂而已也。”^⑤在《〈文心雕龙·诔碑篇〉口义》中，刘师培论及蔡邕对汉晋文学之影响，说：“凡有韵之文能得蔡中郎之一体者皆足成家。孔文举得其叙事之法，故其文雅而润，若王仲宣则能得其雅音者也。”“其(孙绰)文笔之雅虽逊伯喈，而辞句清新，叙事简括，转折直接，皆得力于伯喈者为多。”^⑥ (4) 论文学渊源。刘师培说：“汉人之文，能融化经书以为己用。如蔡伯喈之碑铭无不化实为空，运实为空，实叙处亦以形容词出，与后人徒恃‘崢嶸’‘崔嵬’等连词者迥异。”又说：“蔡伯喈之文亦纯为儒家，其碑铭颂赞固多采用经说，即论事之文亦取法《春秋繁露》，而文章之重规叠矩，则又胎息于荀子《礼论》、《乐论》。故虽明白显露，能含蕴不尽。”^⑦ (5) 论文体纯正。刘师培说：“吊文哀词贵抒己悲，墓志碑铭重在死者。主客异致，心物攸分。蔡中郎擅长碑铭，故客观之文学多。至于唐宋八家之文，作墓志而附加己意，未免乖体。”^⑧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中州士人与东汉文学嬗变”(10BZW033)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② 刘师培《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页。下引刘师培语，版本同。

③ 《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第120页。

④ 《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第125页。

⑤ 《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第113页。

⑥ 《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第168页。

⑦ 《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第129—130页。

⑧ 《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第132页。

稍后,关注蔡邕文学的还有钱基博和黄侃等人。钱基博认为,蔡邕文章“冲和”、“雅淡”,“泽古者深,其辞坦迤,如不经意,而暗与之和,大抵以《书》之端凝植其骨,以《诗》之安和植其节,以《左氏》之整暇调其机。其文以意度胜人,不以骨力见高,舒详安雅,而气如莹,飒飒乎三代之遗音也”^①。“以意度胜人,不以骨力见高”一语,深得蔡邕文章之妙。黄侃认为,蔡邕是“中国文学占有势力者”中唯一的秦汉文学家,蔡邕的碑文对范晔著史和韩愈著文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史记》、《汉书》,尚未纯粹。质言之,班较胜马。至《汉书》以下之文,陈陈相因,四字一句:此种体裁,实出于议碑。而议碑则以蔡邕为主,后范蔚宗以碑为史,韩退之以史为碑,盖范受蔡之碑板影响也”^②。可以说,刘、黄、钱三人的蔡邕之论,远承刘勰,近规清儒,代表了近代“国粹派”学者的基本观点。30年代,研究蔡邕的还有冉德昭,他撰写了《蔡邕评传》,发表在《励学》第1卷第1期上。

鲁迅先生对蔡邕也有研究。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中,他就文学选本的弊端谈到对蔡邕其人其文的认识,说:“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眼光愈锐利,见识愈深广,选本固然愈准确,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杀了作者真相的居多,这才是一个‘文人浩劫’。例如蔡邕,选家大抵只取他的碑文,使读者仅觉得他是典重文章的作手,必须看见《蔡中郎集》里的《述行赋》,那些‘穷工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委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粃而无粒’的句子,才明白他并非单单的老学究,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时的情形,明白他确有取死之道。”^③在此,鲁迅提出了一个评价依据的问题。的确,只有“知人论世”,且了解作家作品的全貌,才能做出比较客观全面的评价,但是,对于时代久远的古代文学而言,是很难做到的,为此,刘师培主张“论各家文章之得失应以当时人之批评为准”^④。

建国后的三十余年里,罕见蔡邕研究专文,期间所编写的各种中国文学史教材也很少论及。中国科学院文

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对蔡邕论述不多,但大体可以代表50、60年代的基本看法。该书指出:“他的文章讲究音节谐协,字句典雅,多用偶句,在汉末很有地位。散文的风格在东汉末年有一个转变。西汉以来的那种朴实厚重的文风这时开始消歇,魏晋典雅清丽的文风开始兴起。蔡邕是这个转变中的代表作家。”^⑤这是建国后较早关注蔡邕与汉魏文风转变关系的论述。60、70年代,国内蔡邕研究寥若晨星,笔者仅见到两篇专题性文章。一是少文(启功)《记汉〈刘熊碑〉兼论蔡邕书碑问题》^⑥。该文认为,蔡邕书写《熹平石经》并创作了不少著名碑铭文,对后世的碑刻和碑志在书法、文献、史料等方面具有深远影响。二是蒋星煜《蔡伯喈之死及其遗文》^⑦。该文只是一般性地介绍相关史实。1959年前后的蔡文姬研究倒是值得一提。当时,郭沫若的剧本《蔡文姬》及《为曹操翻案》一文引起学界轰动。以郭沫若为首,以高亨、萧涤非、胡念贻、刘盼遂、胡国瑞、谭其骧等一大批文史学者为骨干,展开了一场围绕蔡文姬其人及其作品真伪的大讨论。当时的讨论文章主要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后来由中华书局结集出版,题为《胡笳十八拍讨论集》。这些文章在考论蔡文姬生平时往往涉及到蔡邕生平,对蔡邕所生活的汉末社会文化也多有论述,其研究思路和考辨方法亦不无借鉴意义。谭其骧在《蔡文姬的生平及其著作》中说:“文学史专家们喜欢依据作品的风格笔调来判断其真伪,在这方面我是完全无能为力的,还是藏拙不谈的为妙。在这里,我只想就当时的历史事实,作者的生平经历,和作品中所描叙的事物情景相互予以参照,从而对整个问题中所包含着的几个问题,即作者生平的各个阶段和各篇作品的真伪,一一提出我的不成熟的看法。”这里谈到两种方法:一是以“风格笔调”研究作品,二是文史互证,把作家生平、历史事实、作品内容相互对照,进而发现和解决问题。

近三十年来,蔡邕研究愈来愈受重视,在多个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据不完全统计,以蔡邕为主题的研究论文,1980—1990年有十余篇,1991—2000年有二十篇

①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8—110页。此书出版虽晚,但主要内容写于建国前。

②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附录·中国文学概说》,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94页。

③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6册,第414页。

④ 《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第141—142页。

⑤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54页。

⑥ 《文物》1966年第4期。

⑦ 蒋星煜《随笔丛刊》第2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左右,2001年至今有六十余篇,呈倍增趋势。整体上说,这些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一)研究人员多层次化。有硕士、博士和大批文史专家,成果有十一篇硕士论文、一篇博士论文、九十余篇专题论文,难以统计的文史论著也有不少论述^①。(二)研究领域大大拓展,涉及到文学、史学、经学、政治、思想、书法、音乐等,呈现出全方位立体发展的研究格局。在最为集中的文学研究领域,蔡邕研究已由辞赋和碑铭扩展到他的文体学、文学理论、文化成就及其影响等多个方面。(三)研究方法多元化。除了作品校注、著作编年、年谱、辨伪等文献学方法得到较为普遍的采用外,文化社会学、史学、美学、心理学、哲学以及多学科融通方法也群芳竞秀,微观考释成果不断,综合研究也受到重视,整体上呈现向纵深、向宽广处不断开拓的趋势。

二

近三十年来,在蔡邕研究方面,邓安生、刘跃进和高长山三位的研究比较系统全面,成果也相对集中,日本学者冈村繁与后藤秋正的蔡邕论文则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邓安生整理出版了《蔡中郎集编年校注》一书。这是以现代汉语点校并注释的惟一一部蔡邕集。该书以《四部备要》校刊本(清杨以增刻本)为工作本,以严可均辑的《蔡中郎文》和明兰雪堂活字本对校,同时参校其他版本和相关文献,不取《独断》,把其他单篇文章编成上下两册,共四卷:卷一为《编年作品》,按著作年代先后编排校注,卷二为《未编年作品》,卷三为《存疑作品》,

卷四为《附录》,附录为《蔡邕传记材料》、《蔡邕著作辨疑》及《蔡邕年谱》。该书《前言》对蔡邕的思想文化成就和《蔡中郎集》版本概况做了比较全面的评述。他的《蔡邕著作辨疑》一文,考辨了蔡邕“集外”所存作品的真伪、误辑、失辑及旧本的分篇问题,资料翔实,考证周密^②。

刘跃进先生的蔡邕研究是以文献考辨为基础的综合研究,强化了厚实的历史感。他先后发表了《蔡邕著述摭录》、《〈独断〉与秦汉文体研究》、《蔡邕的生平创作与汉末文风的转变》、《蔡邕行年考略》,另有两篇与蔡邕研究密切相关的论文,即《蔡文姬和她的作品》、《东观著作的学术活动及其文学影响研究》^③,还做了《琴操校释》(待刊)。这些文章有一共性,即对有关基本文献做仔细的比勘辨析,并把有关蔡邕的具体问题置于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做整体观照,抓住蔡邕生平、著述及其在汉末文风转变中的作用等关键问题深入开掘。

在关于蔡邕文献的整理方面,跃进先生的《蔡邕著述摭录》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文章根据范曄《后汉书》、《隋书·经籍志》、两《唐书》经籍志(艺文志)、唐宋类书等若干典籍,参考已有研究成果,钩沉索隐,辑录辨析,周详地考察了蔡邕“所有现存著作”的真伪、流传及卷帙问题,推理严密,论断谨慎。

在综合研究方面,《蔡邕的生平创作与汉末文风的转变》展示了一种开阔的思路和文史兼综的研究方法。该文“将蔡邕的思想与创作放在东汉末叶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文风转变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首先描述了蔡邕三次入京的经过,并以此为线索,深入分析了他的政治追求和性格特征。其次,论述了蔡邕的学术文化活动和在

^① 蔡邕研究的硕士论文有:侯深《蔡邕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1年),曾献飞《蔡邕〈独断〉研究》(武汉大学,2002年),傅建忠《蔡邕辞赋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03年),余红云《蔡邕思想及其辞赋碑铭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5年),王璇《论蔡邕在文献学上的贡献》(山东大学,2006年),王银忠《蔡邕碑文研究》(山东大学,2006年),曾伟伟《论蔡邕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湖南大学,2007年),石静《蔡邕思想与学术研究》(山东大学,2007年),李艳峰《蔡邕赋的研究》(云南大学,2007年),赵德波《蔡邕〈琴操〉研究》(曲阜师范大学,2008年),陈彦革《蔡邕创作体裁承变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有高长山《蔡邕文学活动综论》(东北师范大学,2003年)。2009年上半年,又有一篇《蔡邕研究》博士论文,但院校、姓名不详。研究汉代文学的著作,如姜书阁《骈文史论》,下孝萱、王琳《两汉文学》等,也有关于蔡邕的论述。

^② 邓安生《蔡中郎集编年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成书之前,邓安生的《蔡邕著作辨疑》、《蔡邕年谱》及《蔡邕的思想文化研究》曾作为单篇论文发表,分别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6年第6期、《文史论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③ 刘跃进先生以上诸文,分别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4期、《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文史》2003年第1辑、《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后均收入他的《秦汉文学论丛》(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

艺术方面的精深造诣。再次，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论述了蔡邕的文学成就，特别是碑铭创作的特色。最后，展现了蔡邕在汉魏文风转变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第一，在文人利益集团形成过程中，蔡邕的创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蔡邕晚年，地位显赫，建安时期很多作家都得到过蔡邕的提携和延誉。第二，从文学风尚的变迁来看，东汉前期的文学多少还继承着西汉以来庄重典雅的传统。其后，由清峻而华丽，由壮大向通脱。这种转变，在蔡邕的《青衣赋》、《述行赋》等创作中已经显露端倪。第三，蔡邕是汉末文体学研究的重要学者，《独断》一书不仅总结了秦汉以来的文体学成就，也为后来的文体学研究开启了方向”。跃进先生一向强调文学研究要有“历史意识”，“既不能脱离对某一时期具体作品的细致辨析，又不能脱离对某一时期文化背景的深刻认识”^①，这篇文章正是他对这一理念的实践。

关于蔡邕的文体学研究，跃进先生的《〈独断〉与秦汉文体研究》侧重于追溯《独断》所论文体及蔡邕所用文体的渊源及其价值。与此相关，刘后滨在《从蔡邕〈独断〉看汉代公文形态与政治体制的变迁》^②中谈到了《独断》的文体学局限，他指出：“《独断》中关于汉代文书形态的记载，并不能涵盖整个两汉时期的文书制度，只是两汉文书形态演进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如果认定《独断》所载公文只是蔡邕时代的制度，那么我们用它来概括整个汉朝的文书制度，无疑是非常危险的。”

《东观著作的学术活动及其文学影响研究》将蔡邕等东观著作的个体学术文化活动置于当时特殊的学术文化氛围之中，从东观著作的望族出身、据实而录的修史传统、实录无隐的创作倾向以及奉诏创作的特殊场合等多个方面，研究了蔡邕等人在东观的学术文化活动对其文学创作、文学风貌的深层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跃进先生在该文中把“东观著作”作为一个“学派”对待。他认为，包括班彪、班固、马融、张衡、蔡邕等一流文学家在内的东观著作，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共同的学术追求和创作倾向，代表了东汉典雅文学的主要成就，并且产生了深远影响，即东观著作群追求史家风范，由此带动了“各

种杂史、笔记相继而出，中国古典小说由此而兴”；东观著作的辞赋创作追求“实录”风格，带动了汉代辞赋风格由虚矫向质实的变化；“奉诏创作”的特殊场合使得“东观学派”的文学创作必然地走向繁缛典丽一路；东汉文学由此形成了迥异于西汉文学的特质。

高长山的研究主要着力于蔡邕的文学活动及蔡邕对汉魏新风的开启和引领作用。他将蔡邕的文学艺术活动与东汉后期的历史文化背景联系起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即蔡邕对文人奇才的推荐奖掖和对奇书异文的欣赏、刘劭《人物志》和蔡邕碑文人物品鉴理论和审美取向的一致性、蔡邕多重身份的文学艺术活动。他“把蔡邕作为活生生的历史人物、文学家进行多维审视……自始至终坚持文学本位，主要考察蔡邕一生中与文学紧密相关的活动。而对于他在别的领域的贡献，则不过多涉及”。近几年，高长山前后发表了一系列蔡邕研究文章，即《清切哀伤、诗体古旧的蔡邕〈琴操〉》、《魏晋“文学自觉”的先声——蔡邕与东汉文坛的奇人奇书》、《汉魏人物品鉴的审美取向：蔡邕所撰碑文与刘劭〈人物志〉的比较》、《汉晋书法理论的传承与嬗变——兼论蔡邕书论的首创意义》、《蔡邕的“尚奇求异”与魏晋文学演变》、《蔡邕解读〈礼记·月令〉的新变》^③。这些文章主要是对他博士论文中的相关问题做进一步的提炼和开掘，但《蔡邕解读〈礼记·月令〉的新变》一文另辟蹊径，文章指出，蔡邕对《礼记·月令》的解读反映了汉末学术风气的新变，即解经以“博通”为核心、对儒学的态度变“崇”为消解、对自然与王政的关系开始持辩证看待的态度。

1993年，日本汉学家冈村繁发表《从蔡邕看东汉末期的文学趋势》^④一文，着重论述了蔡邕在东汉末期文风转变中的重要作用。文章认为，蔡邕继承了东汉宫廷贵族文学的典雅文风，在汉魏文学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的连接作用：“在董卓政权下的初平年间，尽管当时全国各地的形势极不稳定，但在西都的上层社交界，聚集了以蔡邕为中心的学者文人群，这些人才华横溢，名倾一时。其中有建安文学的杰出先驱孔融，有建安文坛上一流的辞赋作家王粲，有在建安文坛上担当羽翼的邯郸淳、

① 刘跃进《走向通融：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383页。

② 《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③ 分别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第2期、《学术交流》2006年第5期、《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2期、《艺术教育》2008年第8期、《光明日报》2009年4月2日第7版、《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年第5期。

④ 原载《庆祝饶宗颐教授七十五周岁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3年），题为《试以蔡邕为中心论后汉末期文学的趋势》。后来，王琳和牛月明将其译成中文，刊登在《阴山学刊》（社科版）1994年第3期。

路粹、杨修等，他们的确是为下一时期的贵族文学做了准备并使之格外兴盛的优秀文人。注视这种状况的时候，还应加上为人所称道的蔡邕的弟子阮瑀。当时围绕在蔡邕周围的文人阵容已经强有力地构成了建安文学的主要骨架。”该文突出了蔡邕在汉魏文化转变中的首脑地位。后来，刘跃进先生又发挥此说，将以蔡邕为中心的士人集团置于汉末“统治阶级内部高门大族与寒门庶族之间”的权力较量这一社会大背景下，揭示了它“由文人利益集团进而转变成文人创作集团”的实质^①。

当然，在此之前，国内学者也注意到了蔡邕在汉末文风转变中的作用。如前面提到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的观点。1986年，齐天举著文阐述：蔡邕的思想倾向同汉末新思潮是一致的，他在文学艺术上继往开来、力主变革，以其卓越的贡献，成为汉末文风转变中的一位代表作家^②。遗憾的是，这种看法在当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日本汉学家后藤秋正《蔡邕〈童幼胡根碑铭〉与哀辞——论禁碑所产生的影响》^③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首先，该文指出，蔡邕给胡根等夭折者所写碑文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可以补正史之不足。其次，文章谈到了碑铭文体对庄重典雅文风的要求，认为这是碑铭将人物进行非真实的定型化描写的前提。作者引用了日本汉学家福井佳夫关于蔡邕碑铭研究的文章——《关于“碑”的文体——以蔡邕作品为中心》，说：“通览蔡邕碑文中所出现的人物，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碑文的主人公很少有以生活中原形出现的，大多数是被定形化以后登场的。……也就是说，这些被描写的人物大多是当时符合

儒教规范的理想化人物。……想必蔡邕是在明知自己的碑文褒奖过甚的情况下撰写这些碑文的。”第三，该文还探究了蔡邕《童幼胡根碑铭》和哀辞之间的关系，指出了蔡邕为夭逝者作碑文在文体发展上具有重大意义，考察出蔡邕为胡根等夭逝者写碑文出现在严格实施禁碑之前，而“禁碑不仅孕育了埋于墓中的墓志，也是哀辞诞生的重大契机”。文章对碑铭文体特征的深刻分析为重新认识蔡邕那些备受垢责的所谓“谀墓之辞”^④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三

近三十年来，除了上述比较集中的研究之外，蔡邕研究在多个专题方面也都取得了不斐成绩。大致说来，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1. 生平研究

关于蔡邕生平的研究有三点比较新颖。一是蔡邕籍贯。史福庆和张万青《蔡邕故里新考》^⑤认为，史书所说的蔡邕籍贯“陈留圉”不在开封杞县而在开封尉氏。该文除利用相关历史文献外，还注意到了文化遗存的补充作用，显示了文献研究方法的更新，即典籍文献与现实文化遗存的相互参照。二是蔡邕其人。沈沉《题曹娥碑的另有一蔡邕》^⑥、寇志凤《蔡邕新论》^⑦及魏绍昌《两个蔡邕的故事》^⑧都认为，东汉时有两个蔡邕，一为陈留人，一为上虞人。三文都注意到了蔡邕在历史史实与民间传说之间的形象差异^⑨。其实，历史人物在被接受的过程中往往会因种种原因发生多重错位现象，其文学形象、民间传说中的形象和历史形象之间，可能会有

① 刘跃进《蔡邕的生平创作与汉末文风的转变》，《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

② 齐天举《汉末文风转变中的代表作家蔡邕》，《文学遗产》1986年第2期。

③ 《佳木斯师专学报》1996年第3期。

④ 顾炎武从伦理角度质疑蔡邕的文学地位，《日知录》卷一三曰：“东京之末，节义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无守；卓死惊叹，无识。观其集中滥作碑颂，则平日之为人可知矣。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后人为立佳传。嗟乎，士君子出衰季之朝，常以负一世之名，而转移天下之风气者，视伯喈之为人，其戒之哉！”（黄汝成等《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54页）可以看出，顾炎武也认为蔡邕在汉魏文风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⑤ 《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1期。

⑥ 《瞭望》1992年第52期。

⑦ 《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第2期。

⑧ 《中州今古》1998年第5期。

⑨ 或因史料欠缺，或出于文学创作的需要，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高明《琵琶记》和罗贯中《三国演义》均将历史上的蔡邕与民间传说中的蔡邕合而为一，影响非常之大。陆游诗曰：“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很大乃至迥然不同的情况。蔡邕是这样，曹操、诸葛亮、关羽等都是如此，历史赋予了他们多重文化内涵，从文化传播的意义上说，他们一旦进入历史观照视域，就可能成为代表某种意义的文化符号。三是蔡邕两女与魏晋书法传承。张铁民《蔡邕和他的两个女儿》^①考辨了蔡邕两个女儿（文姬和羊祜母）与两晋书法世家王门、卫门、羊门之间的姻亲关系和书法传承关系，可谓一汉晋书法小史，也澄清了相关语焉不详或失之谬误的说法^②。

现代关于蔡邕生平、思想及史学贡献的研究成果，程有为《蔡邕的是非功过》^③发表较早，该文侧重分析了蔡邕对东汉王朝和董卓的“忠义”思想的区别：蔡邕“感激董卓，忠于汉室”，忠于汉室是蔡邕一贯的操守，而他对董卓的惋惜乃是出于对其知遇之恩的感激和对门生故吏基本伦理道德的遵守。程文还对蔡邕的史学贡献给予了令人信服的考证，指出：“司马彪《续汉书·八志》中的五篇，谢沈《后汉书》诸志中的三篇，都采用蔡邕诸‘意’（《十意》）。两晋南北朝多种后汉志书，大体上都本于蔡邕一家之说，没有什么搜求和创见。”

关于蔡邕生平的研究，还有刘孝严《高明和蔡邕》^④、朱国华《蔡邕的悲剧》^⑤、黄晓葵《蔡邕金商门之祸源探究》^⑥、段莲《蔡邕交游考》^⑦等，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古代文学研究学术观念的时代性变化，如从道德评价、政治评价到向文学本位的回归和文化价值的延展等。

2. 著作考辨与注释

关于《琴操》、《独断》的文献研究也有一定进展。

吉联抗、马萌分别对《琴操》的版本和作者做了考异。吉联抗《〈琴操〉考异》^⑧有两个方面价值。一是对《琴操》

的现存版本系统做了一定梳理。文章认为，王谟辑佚的《汉魏遗书钞》本与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本不是一个版本系统，而《读画斋丛书》本、杨宗樱编《琴学丛书》本都属于《平津馆丛书》本系统。二是分析了三篇《琴操》序录所反映的问题：（1）《琴操》作者存在分歧，作者认为，马瑞辰力主《琴操》为蔡邕所作，论据尚欠不足；（2）《琴操》的传本脉络不明；（3）三篇序录从不同角度肯定了《琴操》的价值。马萌《〈琴操〉撰者考辨》^⑨对前人三种说法做了考辨，认为，“桓谭说”基本属于误记，“孔衍说”只能存疑，孔衍《琴操》即使存在，亦属“撰述蔡邕之书”，非孔衍自著。该文把《文选》李善注和《太平御览》对蔡邕《琴操》的引用篇目做了详尽的比勘，从中整理出唐宋时蔡邕《琴操》原本篇目的面貌，有一定参考价值。

赵德波是关注《琴操》研究的青年学者之一。他的硕士论文是《蔡邕〈琴操〉研究》，又发表了《〈琴操〉的作者及其成书》、《繁弦既抑，雅韵复扬——论〈琴操〉的文学价值和艺术成就》、《蔡邕碑颂对〈诗经〉典故、体式的运用——兼论东汉文学与经学的关联》三文^⑩。其主要价值有两方面：一是他注意到了蔡邕作品在民间流传中的演变，按图索骥，探究其文化接受价值；二是他注意到，蔡邕碑颂密集地运用《诗经》典故，碑颂的传文和铭文模拟《诗经》的体式——这是从蔡邕作品的“内在结构”上发掘文学与经学之间的关系。

刘后滨《从蔡邕〈独断〉看汉代公文形态与政治体制的变迁》对《独断》的文本有所考订，他从文字标点、内涵理解两个层次订正了此前存在的误读和误说，如指出了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中的标点错误与其对制

① 《中国典籍与文化》1992年第3期。

② 赵翼《陔余丛考》卷四一“蔡邕女甥多贵显”条说：“蔡邕无子，其女文姬初适卫仲道，后归董祀，生（按：据赵翼条目名，此处“生”原作“甥”）女为司马师妻。又《羊祜传》：母陈留蔡氏，汉中郎将邕之女也。则邕另有一女嫁羊衞，既生祜，而祜同产姊乃景献皇后也。”（采保群、吕宗力校点本《陔余丛考》，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46页）郭沫若剧本《蔡文姬》没有提蔡文姬还有一个妹妹，《文史知识》1983年第4期第90页有“蔡琰是蔡中郎的独生女儿”的说法。

③ 《史学月刊》1986年第2期。

④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⑤ 《读书》1998年第4期。

⑥ 《九江师专学报》1994年第4期。

⑦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6期。

⑧ 《音乐研究》1982年第2期。三篇序录为：《汉魏遗书钞》中王谟的《琴操·序录》、《平津馆丛书》中马瑞辰的《琴操校本序》、阮元等的《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琴操提要》。

⑨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2期。

⑩ 分别见《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5期、《绥化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3期。

书应用范围理解的失当之处。青年学者曾献飞的《独断校笺》^①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参考《独断》各种版本,并从多种类书及史注中辑佚出相关史料,对其中的一些字句做了校笺。

郭铁娜和张世超合著了《〈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边草〉蔡邕作献疑》^②一文,从诗歌的韵律、声律及蔡邕整体创作的“精雅”风格三个方面论证,指出,疑为蔡邕作的《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边草》当为东汉之前流行民间的歌诗,与蔡邕无关。该文从文学内部规律入手,通过对文本解读探究作品真伪,论证翔实可信。

3. 碑文研究

最近几年,关于蔡邕碑文的研究仍然围绕其文学成就及其文化背景展开,重复选题现象比较突出,但对蔡邕碑文文本的分析比较细致深入。

何如月《汉碑文学研究》、《蔡邕碑文创作成就再认识》^③等,对蔡邕碑文的立意谋篇、选材布局、遣词造句、艺术手法做了具体分析,诠释了蔡邕碑文艺术的典范性,使得汉碑的艺术特征——“典雅庄重的语言特色、写实追虚的艺术手法、前序后铭的文体结构”有了具体的参照对象。

黄金明《从蔡邕“惭德”说看汉末文学的演变》^④从汉末政教衰败所引发的礼制、社会风俗、伦理观念等文化背景出发,联系碑文体制,论述了蔡邕碑文所折射出的文风演变问题。文章认为,“蔡邕碑文由以质为主、文质彬彬演为着意于文、追求辞采”,表现出明显的重文轻礼的倾向,蔡邕“惭德”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末文与礼的疏离及其所引发的文人内心的矛盾,也反映了汉末“文”与“经史”逐渐分离而渐趋独立的发展趋势。

关于蔡邕碑文研究的文章还有:何宏玲《论蔡邕所作碑文》^⑤,王银忠《蔡邕碑文非谏碑》和《蔡邕碑文文学研究》

及《略论汉代碑文之碑额题尊》^⑥,李贵银《蔡邕的碑文创作观——由〈郭有道碑〉争议谈起》^⑦,徐海荣《论蔡邕碑文的“谏墓”——与王银忠先生商榷》^⑧,张根云《蔡邕的碑铭文与唐代古文运动》和《酌古始而陋凡今,备文质之彬彬——唐代古文家论蔡邕的碑铭文》及《〈文心雕龙〉论蔡邕》^⑨,王伟萍《为蔡邕谏墓辩》^⑩等。这些文章论及蔡邕碑文的所谓“惭德”或“谏碑”问题,多能从蔡邕碑文的文本分析出发,联系“碑铭”的文体要求、汉代丧葬礼俗需求以及蔡邕的价值判断等问题,立足文献,立足史实,值得肯定。刘师培研究蔡邕碑文的文学史意义,主要是从陆机、韩愈对蔡邕碑文文体的继承和变革的角度立论;王银忠《蔡邕碑文文学研究》则注意到了蔡邕的《王子乔碑》等碑文所表现的“传奇性和趣味性的风格”以及蔡邕碑文对话体的运用,认为它们对碑文文体变异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张根云从蔡邕碑文的“实录”、“雅正”风格循迹到蔡邕碑文和唐代古文运动之间的联系。

4. 辞赋研究

关于蔡邕辞赋研究主要有三方面成果:一是对蔡邕赋文学地位的认识;二是对蔡邕辞赋思想的分析;三是对蔡邕小赋价值的解读。

龚克昌《蔡邕评传》一文,从辞赋流变的角度指出了蔡邕赋的独特价值和文学地位:“汉赋发展到蔡邕手里,已完全从描写帝王的皇宫帝苑中走出来,进入了一般封建文人的生活领域。它的表现范围大大地扩展了。又由于一般文人较接近普通人民,因而他们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也有较大的提高,我们从蔡邕赋里,不但可以看到一般封建文人的生活面貌,而且也能够看到部分人民群众的生活面貌,即是证明。蔡邕赋表现领域的这个大转移,在他之前赋家的作品中也有所反映,但到他这位大赋家的手里才进

① 《襄樊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

②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年第5期。

③ 分别见何如月《汉碑文学研究》(博士论文,2008年)和《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4期。

④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1期。

⑤ 《文教资料》2000年第2期。

⑥ 分别见《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1期、《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2期、《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1期。

⑦ 《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6期。

⑧ 《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3期。

⑨ 分别见《理论界》2008年第7期、《古典文学知识》2008年第4期、《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⑩ 《语文学刊》2008年第11期。

一步完成。这应该说是汉赋发展过程总的一次大跃进，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抒情小赋始终伴随着汉赋发展的全过程。不过，像蔡邕这样的辞赋巨擘，只写抒情小赋而不写宫苑叙事大赋，却是前无古人的。”^①

踪凡《蔡邕与鸿都门学的汉赋观》^②剖析了两种对立的赋观所产生的时代的、社会的、文化的基础，并从蔡邕的辞赋文本中发现了蔡邕赋观与其创作实践的背离，进而指出，蔡邕“把辞赋与政治界定为两种不同层次的社会意识形态”，“蔡邕的汉赋观及其汉赋创作的错位与对立，固然反映了汉赋批评滞后于汉赋创作的历史事实，但同时也透露出文学即将与其他社会科学分离、文学自觉时代即将到来的曙光”。文章立足文献，同时从文学的“内在理路”和社会文化的“外在环境”中寻找文学演变的轨迹，双向并进，分析透彻，确有不少可取之处。蓝旭《鸿都门学之争与汉末文人群体的文学观念》提出了与踪凡不同的看法：“蔡邕根本不反对把赋作为‘聊以游意’的娱乐或审美活动，他所反对的只是辞赋取士及其所包含的危险：即赋予这种本应是怡情悦意的活动以匡国理政的重任。”^③

吴明贤《蔡邕赋论》^④概括了蔡邕小赋情感真挚、描写真实、语言朴实、形式短小的特点。在蔡邕赋的研究中，人们不约而同地发现了它在汉魏文风转变中的意义。如段莲《论蔡邕小赋》^⑤认为，蔡邕小赋“反映出个性的觉醒与审美趣味的活跃”。俞纪东《蔡邕〈青衣赋〉研究》认为，蔡邕《青衣赋》“典型地反映出乐府曲辞对赋的创作的影响，是赋的诗化倾向的重要标志”^⑥。其他研究蔡邕赋的文章还有顾绍烟《托古喻今、寄意深远——蔡邕〈述行赋〉初探》^⑦、傅建忠《典雅：蔡邕辞赋的美学品格》^⑧、刘桂

华《试论蔡邕抒情咏物小赋的艺术特色》^⑨等。

5. 书法研究

随着评价标准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学界的研究视角也呈多元立体格局，而蔡邕在多个领域的杰出成就也使得蔡邕研究具有多方面开掘的潜能。

关于蔡邕的书法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书法理论的文化阐释。苏洪强《散怀恣性，物我同一论——论蔡邕书法的生态美学思想》^⑩指出，蔡邕书论从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出发开创性地揭示了书法的艺术本质、提出了书法佳作的生成条件，即创作主体应回归本源、以自然之心写自然之道、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张运礼《蔡邕的书法心理学思想浅论》^⑪分析了蔡邕书法的心理学思想。黄鸿琼《蔡邕书论的美学思想》^⑫认为，蔡邕书论不但自觉地把语言学范畴的文字与美学范畴的书法区分开来，并且第一次较全面地、较系统地论述了书法美学的本质特征。顾涛《典轨初肇：论蔡邕的书法实践与理论》^⑬认为，蔡邕书法的物象论、性情论、势力论是“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高长山《汉晋书法理论的传承与嬗变——兼论蔡邕书论的首创意义》^⑭认为，蔡邕把“任情恣性”作为书法实践时必须的精神状态是一种审美独创，开启了魏晋书法理论的先河。傅合远《蔡邕书法美学思想的理论价值》说：“（蔡邕）偏重书法‘势’与‘力’的价值取向，体现了汉代艺术注重形质的外在、博大、厚重的审美风尚，与汉代大赋、石刻、画石、雕塑、建筑的审美趣味相统一，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⑮

上述论文主要运用“阐释”法，林京海的研究则侧重于“考据”。他的《蔡邕批评——从魏晋至唐的转

① 龚克昌《中国辞赋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89—590、591页。

② 《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③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④ 《四川大学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4期。

⑤ 《许昌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⑥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⑦ 《贵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⑧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2期。

⑨ 《理论学刊》2007年第7期。

⑩ 《柳州师专学报》2005年第4期。

⑪ 《河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⑫ 《三明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⑬ 《书画世界》2008年第1期。

⑭ 《艺术教育》2008年第8期。

⑮ 《山东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3期。

变》^①具有书法批评史性质。文章首先梳理了魏晋书法文献，认为蔡邕在魏晋书法史上并不具有特别意义。而后，该文辨析了《后汉书·蔡邕传》关于蔡邕正定六经文字、“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于太学门外”的记载，认为该记载有误，蔡邕并无“书丹于碑”的可能。关于唐人推崇蔡邕书法的现象，林京海认为，唐人为适应时代风尚的需求而“有意识地塑造了一个在书法方面身体力行、名迹遍天下的先贤，同时又附会其身以书法传授之祖的特殊形象”。

6. 音乐及其他

蔡邕的音乐才能及音乐成就就是较早受到关注的一个方面。20世纪80年代关于蔡邕的论文不过十余篇，却有三篇是谈音乐的，即吉联抗《桓谭和蔡邕》^②、许健《蔡邕与焦尾琴》^③、逸卿《蔡邕慧眼识材》^④，三文均旨在评介蔡邕的音乐天赋和听琴、制琴的雅事。近年来，关于蔡邕音乐贡献的研究有所深入。陈绍皇《蔡邕音乐思想》^⑤从蔡邕的音乐作品本身发掘其音乐思想，并结合蔡邕对音乐理论的表述予以阐述。“内外结合”，方法不错。王作良《琴操与昭君题材的文学化进程》^⑥从音乐与文学的关系入手，指出，王昭君在《琴操·怨旷思惟歌》正式进入文学领域，被赋予了强烈的寄托色彩。汪青《雅韵琴音——蔡邕〈琴赋〉的文学与音乐解读》^⑦认为，《琴赋》体现了蔡邕对典雅美及雅乐教化作用的追求。

还有学者涉足蔡邕的天文学成就和文化传播贡献。贺艳珍与段海龙《简述蔡邕在天文方面的贡献》^⑧指出，蔡邕在续补《汉书·律历志》、编写《乾象历术》等工作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史中应占有一定地位。成公亮《古琴曲〈龙朔操〉》^⑨、王燕钧《历史上最早的万卷藏书家》^⑩、范凤书《蔡邕藏书及其传递影响追探》^⑪、王大德《蔡邕与档案》^⑫则着眼于蔡邕藏书的历史影响，但

旨在介绍史实，未作深层论析。

结 语

纵观百年蔡邕研究，在蔡邕的生平、作品系年、别集校注等基础文献的整理研究方面，已取得了比较坚实的成果；关于蔡邕的碑文、辞赋、文风、文体学成就以及他在汉魏文风转变中的作用等整体性问题，也已完成基本共识；对蔡邕的思想、经史成就、文艺主张等也有所探究；这些都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较好基础。

但是，蔡邕研究还有许多有待开拓的空间。就研究范围言，蔡邕的章表、奏疏、铭、赞、论议等应用文的研究、蔡邕与地域文化的关系等，还很少涉及。就研究深广度而言，对蔡邕与传统学术之间、蔡邕文学与秦汉魏晋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蔡邕与文化传播，蔡邕的文学艺术思想及其与传统哲学、美学、文士风尚之间的关系等，这些涉及文化发展的整体性和内在逻辑性的问题，均有继续拓展的空间。就基础文献的整理而言，蔡邕的《独断》等著作的文本整理等，亟需展开。就研究思路言，个案研究较受关注，而整体宏观的研究比较欠缺。就研究方法言，文献学方法与阐释学方法的结合还很不够，特别是在对具体作品的解读上，脱离当时历史文化背景，脱离蔡邕的思想体系与文学创作整体情况，阐释过度而文献不足的泛泛而论现象，时见发生。

我们期待着蔡邕研究得到足够的重视，并取得历史性的突破，这不仅是单独的作家研究问题，还关系到对比较薄弱的东汉散体文学、东汉历史文化和东汉士文化等宏观问题的研究和认识。我们同样期待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能在学科观念、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研究领域等方面不断超越，走出一条富有民族特色、富有时代特色的研究之路。

[作者简介]刘德杰，女，河南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发表过论文《德行决定命运：〈汉书〉文化精神解读》等。

① 《书法之友》1994年第6期。

② 《中国音乐》1983年第1期。

③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1986年第4期。

④ 《音乐爱好者》1986年第3期。

⑤ 《怀化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⑥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4期。

⑦ 《名作欣赏》2006年第5期。

⑧ 《雁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⑨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1987年第3期。

⑩ 《图书馆杂志》1986年第4期。

⑪ 《河南图书馆学刊》1986年第6期。

⑫ 《档案管理》1988年第2期。